

中国史学科发展的趋势与新理论方法

王 健

“中国史”学科包含中国历史研究的断代、专门与理论、实证各个领域，是我国历史学研究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重要的分支学科之一。2011年2月，国务院学位办重新划分学科目录，原历史学一级学科一分为三，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学分别成为一级学科。中国史一级学科下设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当代史、专门史、历史文献学和历史地理等二级学科。当前，国内各综合性重点高校、师范院校和社科院系统均有研究方向较为齐整的中国史一级学科设置。近年来，国内中国史学科发展迅猛，并形成许多重要学术成果和具有深远影响学术论争，极大地推动学科的发展，也展现了学术的多样化。同时，中国史学科面临两大机遇与挑战：一是新的理论方法层出不穷，学科之间的科际整合与跨学科趋势愈益明显，任何学科都不可能固步自封，必须回应学术与社会的新形势，这就要求中国史研究不仅要“走出去”，吸收借鉴新的理论方法，还要适时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二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史学研究也受到极大的影响，一方面史料突破传统的纸质形制，电子史料使获得史料、输入史料不再是难事，而计算机信息技术又催生史学研究的“大数据”时代，史料分析、量化研究、比较研究将越来越普遍，史学研究越来越面向公众，这就要求研究者的思维、方法与技术必须适应这一变革。以下以二级学科为单位，介绍近年来中国史学科发展趋势与新理论方法。

（一）史学理论学科

史学理论二级学科一般包括涉及宏观抽象的“历史观”与具体具体的史学理论及方法论。近年来，中国史学理论界的探索有两大热点，一是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二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史学研究造成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唯物史观是中国史学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唯物史观，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从改革开放至今，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

学习更加深入，理解更加全面，运用更加合理，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教条主义偏颇。这一阶段，历史学界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从而对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有了更加理性自觉的认识，主要表现在：第一，唯物史观是研究历史的指南，决不是可以随意套用的公式。尽管经典作家早已强调这一点，但人们只有在经受了曲折和失误之后，才深切地懂得了这个道理，从而走出“套用公式”的误区。第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人们只有全面地认识这个体系、辩证地理解它各个原理之间的关系，才不致使它遭到误解或曲解，避免自身的研究走向片面以致错误。第三，唯物史观的生命力，在于人们以其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从大量的历史事实中概括出新的理论认识，从而不仅使这一研究得到正确的或近于正确的结论，同时也丰富了唯物史观，以至于发展唯物史观。¹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 1978 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涌现出对唯物史观及其对历史学指导意义的探讨热潮；20 世纪 90 年代，这种研究和探讨相对地走向沉寂；进入 21 世纪以来，对唯物史观及其对历史学指导意义的探讨再次出现活跃局面。²2001 年，蒋大椿发表《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阐释当今史学所存在的问题，并对当今中国史学界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行理论反思。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所缕述的史学思想较之其上世纪 80 年代的史学思想更是有了大幅度的转变。他指出：“文革结束到 20 世纪末……就史学思潮而言，唯物史观的影响在下降，多种思潮竞争，史学思潮的多元化正在逐步地实际形成。”他还认为：“唯物史观已经到了应当进行自我批判的时候了……唯物史观确实存在着相当多而且严重的理论缺陷”。虽然蒋大椿对传统唯物史观进行了全方位的理论批判，但在文章中他仍然认为经过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自我批判，“马克思主义史学会运用重新理解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考察历史，它将拥有足够的理论潜力与各派史学竞争，继续真正地在我国史学发展中居于主流地位，并在理论与实际历史相结合地研究中取得更加蓬勃地发展”。³这篇论文发表后，史学界尤其是史学理论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争辩，有相当多学者对

¹瞿林东：《历史学的理论成就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

²吴英：《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近三十年探讨的回顾和展望》，《历史研究》2008 年第 6 期。

³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 年第 4 期。

蒋大椿的观点进行商榷、批评。⁴虽然蒋大椿的某些观点或有缺失，但他提出的问题以及由此展开的学术讨论，却引发了学术界和理论界对唯物史观更深层次的思考，这对深化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无疑是有推动作用的。学者们反思以往唯物史观与现实研究之间的脱节和教条主义问题，试图将理论更贴合实际。进入新世纪以来，主流理论界与史学界将坚持唯物史观作为把握历史研究方向的根本方针。《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研究》等国内权威刊物加强了刊登关于唯物史观研究的论文的力度，巩固了唯物史观的研究阵地。

改革开放以来，有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开始在学术界和社会上蔓延。历史虚无主义既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历史虚无主义认为，作为哲学意义认为世界，特别是人类的存在没有意义、目的以及可理解的真相及最本质价值。与其说它是一个人公开表示的立场，不如说它是提出的一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在史学领域，特别是在关于中国革命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某些问题上，历史虚无主义忽视历史的真实性，旨在质疑和消解历史的真实性和革命的正当性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做“翻案”文章，须引起足够警惕。这几年来，深化和弘扬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最行之有效的武器。2014年，“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成为中国学术界争鸣大事件。⁵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唯物史观研究新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史学理论研究领域另一大热点是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对史学思想和史学研究的冲击。后现代主义产生于1960年代的欧美哲学界，以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人为代表。随后，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史学领域。后现代主义史学是对“现代主义”史学的反动。1990年代后，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传入中国。后现代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界造成冲击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 Hevia）著《怀柔远人：清代的礼宾与1793年马尔嘎尼使团》一书的出版。该书用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观点“解构”清代的中西礼仪问题及由此带来的“朝贡体系”论述，1995年英文版出版后引发美国中国史学界的极大论争，欧美知名中国史学者周锡瑞（Joseph Esherick）、艾尔曼（Benjamin Elman）、胡志德（Theodore Hutters）、张隆溪等人对何伟亚运用的后现代主义方法发生意见分歧，评价褒贬不一。中国知名学者罗志田在国

⁴刘方现：《近年来围绕唯物史观的理论争鸣》，《历史教学》2005年第3期。

⁵《2014年争鸣大事件（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22日。

内首先介绍此书，虽然没有表明对后现代主义的态度，但明确肯定何伟亚的贡献，认为这一研究范例“动摇史料与解释之间那种通常以为众皆认可的关系”。

⁶该书于 2002 年出版中译本，⁷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更为直接。

中国史学界的后现代史学研究大致分两类，一种是对后现代史学这一理论本身的研究。随着学术国际视野的拓展和哲学素养的进一步提升，中国史学理论界对后现代主义的探究更加深入，而不再局限于后现代思潮传入中国后，在没有厘清、理解之前就一味的追捧或全盘否定。黄进兴既从事近世宗教与思想史研究，又对西方哲学与史学理论有较深刻的体认，对西方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史学思想的源流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进行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后现代史学对传统史料与史著均起了极大的质疑，其破坏力难以估量；但它所倡导的“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与所开放的研究议题，却值得我们深思择取。⁸于沛不认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观点，不过认为应该在与后现代史学的撞击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理论。

9

另一种是后现代史学思想或方法对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等专门史研究领域产生的影响。葛兆光在构筑“中国思想史”的新体系时特别注意到后现代主义的启示，认为在思想史的书写中可以扩充史料，即从“六经皆史”到“史皆文也”。¹⁰此外，赵世瑜对历史记忆的研究¹¹；杨念群提出的“地方性”与“地方感”问题，对“现代病人”的研究，¹²均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不过，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那些在研究中有较明显的后现代痕迹，或被认为是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学者，他们没有人承认自己属“后现代史学家”，当下的中国史学界也没有人公然宣称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后现代史学”。这恰说明后现代史学在中国并未形成一个完备的学科形态或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史研究可借鉴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有益成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反思史料史实之间的互动关系。但中国史研究有产生于本土时空语境中的问题，借鉴后现代史学当慎之又慎，切不可照搬照抄。

⁶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⁷何伟亚：《怀柔远人：清代的礼宾与1793年马尔嘎尼使团》，邓常春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⁸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三联书店2008年版。

⁹于沛：《后现代主义和历史认识理论》，《历史研究》2013年第5期。

¹⁰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136页。

¹¹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¹²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二）中国古代史学科

中国古代史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与古代中国相伴而生。中国古代史二级学科大致包含古代通史、断代史与古代专门史三个类别。从晚清民国“新史学”开始，各种类型“中国通史”始终是各个时期中国史学的压舱石，编撰一部《中国通史》也往往是诸位史学大家的重要治学目标。建国前，钱穆、吕思勉、周谷城与张荫麟等均有自撰的通史问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建国前也编写中国通史，建国后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相继出版或出齐。这几部著作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写作的基本样式，对当时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繁荣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从1989年至1999年，白寿彝集国内各高校研究机构近500位历史的学者之力，完成12卷22册《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中国通史》是至今规模篇幅最大的中国通史著作，充分反映20世纪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代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和集体智慧。然而，新世纪以来，除了高校教材《中国通史》或《中国古代通史》，古代史学界再无纯学术性的通史问世。这说明一方面史学界对大型中国通史的编写已缺乏学术热情；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断代史和专门史的划分越来越细密，类似“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中国古代史学界极少有人有横贯的学识学力，难以独立编写通史，以往以通史带动断代史研究的前事已不复。

在断代史研究方面，由于建国以来高校历史系教研室体系的完善以及国家各级学科、专业与研究方向的规范化，中国古代史学界内从先秦至清代各个断代均有齐整的研究队伍。新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五年内，各断代史的前沿领域呈现出各自新的特征与学术增长点。例如，先秦史研究越来越多地与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相结合；秦汉史研究集中于运用近年来新出土公布的简帛文书；中古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十分关注权力与信仰的探讨，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与碑刻史料的运用也大大加深；蒙元史研究进一步拓宽视野，加强对蒙古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等民族语文资料的运用，在“内亚”和“草原帝国”的主题下重新探讨元朝统治下的中国历史；明清史研究中则有越来越多的区域社会史论著。

现重点介绍“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是当前中国史研究中十分热门的一种研究方向与方法论。学界对历史人类学定义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是用人

类学的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改变以往一味依赖传统的传世文献的实证研究方法，转而更多关注“田野工作”，将研究目光下移，关注民间社会，如宗族、民间信仰、民间传说、风俗习惯、民间契约文书等。中国的历史人类学最早出现在明清史领域，现在从宋史到现代史都有历史人类学的身影。可以说，“历史人类学”的提法已在中国古代史学科中形成一股独树一帜的力量。

中国古代史学科中的“明清社会经济史”方向在早期就有“眼光向下”的传统。这种传统最早的确立者是厦门大学的傅衣凌与中山大学的梁方仲等学者。他们的学生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在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过程中，接受了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大概在1990年代中后期，中山大学与厦门大学的明清史研究学者开创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历史人类学取向，他们与香港学者科大卫(David Faure)的学术团队理念相近，被称为“华南学派”。此外，北京学者赵世瑜的研究也被归入“历史人类学”。中山大学设有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厦门大学设有民间文献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设有比较及公众历史研究中心，这些是历史人类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凝聚了相当一批中青年学者。

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是结合传统史学实证研究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之长。例如，刘志伟将珠江三角洲研究概括为“地域社会的文化结构过程”(structuring)，所呈现的乃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结合，人类学研究的“结构”与历史学研究的“过程”结合。在他所罗列的五个议题中，沙田(土地开垦与地区开发)、宗族、户籍，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是研究的主要课题，神明崇拜与族群问题，古曲虽然一般不在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野中，但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¹³在这些课题的研究中，研究者通过亲身田野的“参与”，挖掘了大量民间文献，把视角从制度史拓展到“国家”与地方文化自我构建的关系中，强调文化权力在区域社会中的作用。不过，历史人类学或区域社会社会史研究在历经二三十年的发展后，如何构建未来的方向，仍须认真检讨。目前，相关研究越来越多，但也存在议题的微观化与个案化趋势。如果区域社会史放弃历史学追求贯通宏观的基本学术追求，放弃历史学的学科本位，那么其学科合法性也将消解。另外，历史人类学或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者越来越多，田野工作也越做越规范，但很多人却缺乏基本的史料训练，没有传统史学的根底，如此“民间文献”他们也未必能读懂。

¹³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无法理解史料，尽管有新颖的视角，但研究结论一定是不正确的。有学者指出：“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在田野背后所需花费的案头功夫才更感重要和迫切。毕竟史科学、目录学和校勘学都是史家治史的基础，是史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特色和标志。对某个特定时代历史的把握，更应该是史家之所长。”¹⁴

从总体上评估计中国古代史学科的发展趋向，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古代史学界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第二个十年（20世纪的最后十年），研究者更多关注的是对具体问题的考察，彼此之间的交流有限，对学科发展的整体性思考较为薄弱；进入21世纪后，一些学者开始从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思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以及本学科发展的走向。¹⁵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是有史以来研究讨论最活跃的时期，这一方面得益于新资料（包括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挖掘与重新审视，另一方面也与新的理论和问题意识的涌现有关。当然，也应该看到，在突破以往“五种社会形态”等理论框架后，中国古代史的新理论多来自海外，尚未形成本土性的原创理论，建构中国本土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新体系尚任重道远。

（三）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含中国当代史学科）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上半叶，当时有部分高校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蒋廷黻、陈恭禄、罗家伦、郭廷以及范文澜等学者从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但是，中国近现代史作为一个学科，真正得到确立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受政治与社会氛围的影响较深，学科的发展充满曲折，理论模式也很丰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进入空前繁荣期，旧有的意识形态羁绊渐渐挣脱，新的研究领域大量开辟，新史料、新观点、新方法不断涌现，与海外学术界的交往大大加深，遵守学术规范成为近现代史学界的通则。

以“中华民国史”研究方向为例。最近学术界对民国史特别重视，相关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可称得上“显学”。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民国史没有严肃的研究，只有批判和政治宣传，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涵盖了民国历史。真正开展民国史研究是1980年代之后，学术界的思想也不断解放，民国史作为一个新兴的历史学科，逐渐由“险学”转变为“显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¹⁴定宜庄：《三十年来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¹⁵彭卫：《21世纪初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民国史研究室、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等一大批专门从事民国史的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中华民国史的大部头专著陆续出版。2006年，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中心推出4卷本《中华民国史》¹⁶。2011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推出《中华民国史》共36卷¹⁷，含大事记12卷，人物传12卷。2015年，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组织大陆学者携手台湾学者，推出两岸合写的18卷本《中华民国专题史》¹⁸。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发展趋势：第一，由不乏情绪化的类似“非此即彼”式的研究转变为冷静理性的研究；第二，由简单照搬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转变为将其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研究；第三，由大多以主要精力关注历史细节的研究转变为同时兼顾历史大视野的研究。¹⁹不过，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仍存在一些瓶颈问题。如在当前近现代史料急剧扩充之际，如何从原来的“找得到”转变为“看得懂”，从原先简单串联史料做“粗放式”写作，过渡到在深入解读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史实重建”，依旧要继续探索。另一方面，在近现代史领域，如后构建理论、处理理论与史学研究关系的问题尤为突出。正如有学者指出：“各种史学或非史学的理论都可能有助于研究者观察、认识和分析问题；多接触、了解和借鉴各类理论显然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在具体题目的研究上，则不一定非要套用什么样的理论不可。因为任何具体的理论都自成‘体系’，有其附带的框框，未必全适用于异时异地异学科的研究。从根本言，若把‘理论’定义到切入角度、认识立场和研究取向等非常宽泛的程度，史学研究显然离不开理论。就具体的个案考察分析而言，像一些社会科学学科那样先明确所依靠或运用的理论，然后按图索骥式地循理而论，当然不失为一种可以尝试的方式；但是否必须如此，我也还有些存疑。”²⁰

与中国古代史学科不同，中国近现代学科有成体系的理论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内部存在的“革命”与“现代化”史观（研究范式）之争。

¹⁶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4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¹⁷李新总主编：《中华民国史》36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

¹⁸张宪文、张玉法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18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¹⁹曾业英主编：《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33页。

²⁰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

一般来说，从193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革命史观”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到1950年代以后，革命史的研究范式的正统地位在大陆史学界得到完全确立。但到了19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大踏步迈进，现代化研究范式开始逐步取代革命范式而处于近现代史研究中核心地位。从今天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势来看，“现代化”的步伐已无可阻挡，而且一般都能获取“政治正确”的话语支持。然而，无论是革命还是现代化，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存在的事实，不能互相否定，用一种观念抹杀另一种观念。未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否可以突破以上两种范式，构建新的理论框架，尚拭目以待。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存在这一种明显的趋向。即随着研究者的眼光越来越向下，各种史料越来越丰富，研究的题目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史学研究出现了一种称之为“碎片化”的研究趋势，这在中国近现代学科最为明显。史学研究的“碎片化”与以往“宏大叙事”相对，讲求研究的微观化、去价值化。关于“碎片化”研究的利弊，以及“碎片化”与“整体史”的关系，近现代史学界有很大争议。

《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与第5期发表两组13篇“笔谈”讨论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各位学者对史学研究中“碎片化”的各抒己见，意见多元，未达成共识。有些人提出拒绝微观研究成为史学主流，“重建宏大叙事”²¹，有些人认为“碎片化”并不阻碍史学发展²²，有些人认为“碎片化”是通向“整体史”的必由之路²³。这些意见表明“碎片研究”是当下史学的一种趋势，并有较强的学术基础，当然不能一味否定，但史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追求贯通和宏观，所以不能因为出现越来越多的微观研究而丧失史学研究的主旨。

中国当代史是一门研究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学科，也是历史学中最年轻新兴学科之一。中国当代史与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有很密切的联系，但也有很大的分别。改革开放后，当代史的提法开始出现，但真正确立中国当代史学科地位的则要到1990年代。1990年，专门以研究共和国史的国家级研究机构当代中国研究所（现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1994年中国当代史学术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创刊，同时各高校历史专业开始开设“中国当代史”或“中华人

²¹王学典、郭震旦：《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²²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²³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4期。

民共和国史”课程。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史研究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加入中国当代史研究队伍，各高校、社科院系统也加强了当代史研究的力量，设置专门研究机构。近几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学者纷纷从原先的中国近代史、历史地理等转向中国当代史学科，从事集体化时代农村社会、1950年代社会史、冷战史等方面的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果，并通过学术会议、学术工作坊与研究生研讨班等扩大中国当代史学科的学术影响力。此外，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当代中国研究所于2012年共同设立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国情调研上海基地，并恢复了当代史研究室，主要围绕当代中国发展战略与上海开展相关研究。

大致而言，中国当代史学科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向：一是寻求自身的学科定位，谋求学科建设；二是加深史料挖掘，进行严谨的历史学研究。在当前条件下，中国当代史研究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是重视基层史料，如集体化时代的农村档案、当代工厂档案、当代普通人的日记、信函、口述史等，这些史料有的在图书馆、档案馆中，但更多需要研究者从事“田野工作”得来。利用这些社会基层史料进行当代社会史研究，从而突破当代史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史的现状。二是注重理论方法建设。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相对欠缺，在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政治导向的前提下，当代史研究应充分考虑借鉴各种理论，如比较现代化方法、国家与社会分析方法、制度主义方法等。²⁴三是拓展视野，突破近现代史与当代史的学科樊篱。中国当代史的许多问题不能仅仅只到1949年后寻找答案，当代史源于近现代史，甚至是古代史。因而应以贯通的目光审视当代问题，加强历史研究的整体性与宏观性。

（四）专门史学科

专门史系相对断代史而言，断代史以时间纵向划分，专门史则侧重历史的各个横切面。传统意义的专门史主要有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法制史、军事史、外交史、教育史、地方史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以及国内史学界自身学术增长点的催发，有许多新兴史学门类加入专门史行列。新世纪以来，有相当多的“新专门史”完成了“正名”，日益显

²⁴苏智良：《中国当代史建设刍议》，《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示出巨大的研究活力，例如城市史、环境生态史、女性性别史、医疗卫生史、物质文化史、交通史、公共史学、口述史等。这些新的专门史类型诞生于发展与新的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创新有关，也是中国史学界对新的史学议题不断探索的结果。

以城市史学科为例。中国城市史学科的历程并不长，从 1980 年代起步。起初是上海、武汉、天津与重庆等几个城市的个案研究，之后慢慢汇集为中国城市的整体研究。并有最初的集中在近现代到目前拓展到古代和当代时段。城市史学科又派生出城市社会史、城市文化史、城市经济史、城市社会生活史等。城市史对于社会科学理论的学术敏感性很强，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的理论视野，以及历史地理信息系统（HGIS）技术，都对城市史研究的深入产生极大影响。近年来，中国城市史研究产生了 25 卷本《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²⁵这样重量级的学术著作。

近年来，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方法更为多样，问题意识更为多元，突出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越来越重视西方新理论方法，如“空间”理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全地方转型，城市也随之转型，其外在空间形式变化最为剧烈，并引发社会结构的变化。陈蕴茜指出，空间本身是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载体和场域，空间格局决定着人对空间的感知以及行为方式，具有规训民众、改造大众文化的功能。在民族国家建立后，国民教育成为建立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国家往往利用空间对民众进行身体与心灵的塑造。从晚清到民国，城市中出现了大量公共空间，如博物馆、图书馆、公共体育场、公园、新式剧院等，生活于城市中的人，无处不在地被空间规训着，公共空间成为国家和精英规训、引导大众文化的场域。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深入探讨近代中国城市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有利于促进城市规划在大众文化发展中发挥积极功能。²⁶二是城市史的跨学科性越来越强，城市史不仅跨越传统的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等历史学二级学科的樊篱，而且与各类社会科学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城市发展的历史既有微观和侧面，也有整体和宏观。从现状来看，对于单体城市、城市某一方面的研究以及某一区域和某一时段的城市史的研究都做了一定的工作，但综合性的系统的整体宏观研究相对较弱。虽然许多学科参与了相关的专题城市史的研究工作，

²⁵熊月之主编：《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25 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年版。

²⁶陈蕴茜：《空间维度下的中国城市史研究》，《学术月刊》2009 年第 10 期。

但城市史的整体宏观研究只能由城市史学来完成。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之一的城市史学，不仅要对中国城市史进行微观的、局部的、单体的研究，更要对其进行综合的宏观的系统的整体研究。城市史学将城市发展的历史置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下分析考察，对于城市整体、城市体系、城市系统的历史发展进行历史的考察分析，如此可将中国城市史研究持续引向深入。城市和城市史的综合特性，决定了在城市史研究中需要多种学科的广泛参与，需要进行跨学科的研究。²⁷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期致力中国史学科的学科建设，把握学术方向，紧贴理论前沿，追求卓越的学术成果。历史所成立至今，在近 60 年的发展历程中，老一辈历史学家李亚农、周予同、杨宽、唐振常、沈以行、汤志钧和李华兴等前辈学者筚路蓝缕，近年来中青年学者焚膏继晷、奋发图强，研究工作涵盖中国史学科各个方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上海城市史等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成为上海市乃至全国中国史研究之重镇；近年来，历史所又大力扶持江南史与中国当代史研究新学科增长点，体现出扎实稳健的学科发展趋向。

²⁷毛曦：《中国城市史研究：源流、现状与前景》，《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 期。